

论康熙帝的词学活动及其影响

陈昌强

内容提要 康熙帝是清室诸帝中唯一一位对词学表现出特别关注的皇帝，他不仅作词多阙，而且精心选命臣工，编纂词籍，并钦定序言，颁行天下。这些词学活动是康熙帝“文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反映了“文治”理念的深化，即由因势利导发展成创策垂法。康熙帝的词学活动对当时词坛既有借鉴，又有多层面的影响：其词虽未臻上乘，却引领贵族群体填词之风；《御选历代诗余》既反映其尚雅主张，也反映词坛现实，其选阵显示出对浙西词派词论的认同；《钦定词谱》为明清之际谱律学完成了总结，并给后世以示范；而其词学主张则杂糅众家之说，同时融入诗教观念，特别是其“寄托说”给后世词家以借径，间接促成乾嘉以后词学的再度兴盛。

关键词 康熙帝 词学 《御选历代诗余》 寄托

在六十余年君临天下的漫长岁月中，康熙帝身边从来不乏文学侍从之臣，部分臣工如王士禛、朱彝尊、纳兰性德、查慎行等人，甚至是名动天下的词坛宗主。以康熙帝的聪明睿智，“圣学无所不窥”，为何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左右，方始留意词学？而一旦瞩目，即从自行创作，并与词臣赓和，到选任臣工，开馆修纂《御选历代诗余》和《钦定词谱》，甚至钦定其序并刊行，其对于词学的热情在清室诸帝中绝无仅有。这种热情出现的背景何在？在其“圣学”体系中如何定位？与其所倡导的“文治”又有何关联？词发展到康熙朝中后期，已经历了云间、广陵、阳羨、浙西等流派或词人群体的众声喧哗式的中兴，词坛渐渐被浙西一派的后继者所占据，康熙帝这时颁布其关于词学的“天语纶音”代表了什么倾向？会对词坛产生何种触动？又如何去评价呢？本文拟带着这些问题，在前人研究^①的基础上，通过探析这位体国经野者的观念和行动，对清初词学演进中的一些问题作出回答。

康熙帝对词学的关注，最早表现为创作。其存世词作共十二阙，依次为：《柳梢青·咏岭外金莲盛放可爱》《太平时·立春》《点绛唇·前过江浙，桃花已放，今回銮至津门，复见桃花盛开》《点绛唇·春雪晴望》《风入松·腊日》《柳梢青·乙酉仲春南巡船窗偶作》《临江仙·自镇江之江宁》《万斯年曲·天宇咸畅》《柳梢青·香远益清》《太平时·云帆月舫》（以上三阙同属《御制热河三十六景

^① 目前学界研讨康熙帝影响清初词坛的学术成果，主要有于翠玲《康熙“文治”与词学走向》（《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和黄建军《康熙与清初文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2—272页）。于文侧重于分析博学鸿词科及《御选历代诗余》、《钦定词谱》对词籍编纂的影响；黄著对康熙帝词与词论有所涉及，然未能深入。

诗》)、《点绛唇·檣灯》《鹧鸪天·擎盖荷珠》^①。若单从数量而言,康熙帝在词创作上的热情无疑远逊于诗,但相对于清代帝王词普遍荒落的情况^②,仍属难能可贵,接下来,我们对这些词作具体分析。

首先,这些词的创作时间相对集中,从康熙四十年(1701)延伸至五十四年(1715),属于康熙帝后期的作品。其第一阙词为《柳梢青·咏岭外金莲盛放可爱》:

万顷金莲。平临难尽,高眺千般。珠蹙移花,翠翻带月,无暑神仙。俗人莫道轻寒。悠雅处、余香满山。岭外磊落,远方隐者,谁似清闲。

这首词具体创作于何时?《清圣祖御制诗文》《康熙诗词集注》中并未作出具体说明,不过,因其编于《为考试叹》(作于康熙三十九年六月)和《大城文安等处堤修完舟中驻蹕王家口》(作于康熙四十一年正月)二诗之间,其创作当在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年之间。考《清史稿》本纪,康熙帝这两年皆曾巡幸塞外,然行期有别:三十九年,秋七月丁巳(初六日)始发,冬十月己卯(二十日)还京,十一月辛亥(二十三日),复巡幸边外,十二月戊辰(初十日)还京;四十年,五月丙辰(三十日)始发,九月乙巳(二十一日)还京^③。因金莲盛放的花期在盛暑,则该词当作于康熙四十年夏间。

康熙帝其余的词作,创作时间皆颇明确。据《康熙诗词集注》,《太平时·立春》作于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点绛唇·前过江浙……》作于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三日,《点绛唇·春雪晴望》作于康熙四十三年二月,《风入松·腊日》作于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柳梢青·乙酉仲春南巡船窗偶作》作于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十六日,《临江仙·自镇江之江宁》作于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万斯年曲·天宇咸畅》《柳梢青·香远益清》《太平时·云帆月舫》作于康熙五十年,《点绛唇·檣灯》作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鹧鸪天·擎盖荷珠》作于康熙五十四年夏。这段时间,正是康熙帝诏敕修纂《御选历代诗余》(成于康熙四十六年)和《钦定词谱》(成于康熙五十四年)之时。可见康熙帝留意词学并非单向度的,除了选命臣工纂辑词籍,自己也多有“试水”之作,两方面的努力相辅相成。康熙五十四年以后,康熙帝仍然创作了大量的诗,但于词却不再问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其在词学方面的“文治”功业已有成就,对此也就不再留意了。

其次,这些词作的形式和内容都比较单一。从形式上看,除了《风入松·腊日》字数较多,属中调,其余皆为小令,无长调慢词。小令无须费心结构,较易于填写,不会有苦吟之累,对于康熙帝这样勤于政务的皇帝而言,较为适合^④。从语言上看,这些词作题旨明晰,单刀直入,风格平实,使用典故非常少^⑤。从其内容上看,也多描绘太平景象,刻画升平物态,抒发其富贵清闲的生活旨趣,并表达其仁化爱民的帝王情怀,为其文治德政作注脚:

冲寒待腊雪花飘。词意并琴挑。嘉平岁暮春光近,朔风冽、裘暖狐貂。须晓民间衣薄,那知官里宽饶。隆冬气惨绛香烧。披览共仙韶。毡帘软幕凉还透,微云一抹散琼瑶。听得梅将开

① 《清圣祖御制诗文》,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5册,第413、416、424、436、440页;第6册,第5—6、12、24—26、387、409页。王志民、王则远《康熙诗词集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0、453、473、500、513、524、545、578、582、585、601、661页。本文所引康熙诗词皆据《清圣祖御制诗文》《康熙诗词集注》,不另作注。

② 据《清代御制诗文集》统计,乾隆帝因和康熙帝《御制热河三十六景诗》,曾作词三首,咸丰帝集中有词二首,其余诸帝俱无词作。又,康熙帝一生共作诗1135首,参见《康熙诗词集注》前言,第17页。

③ 《清史稿》卷七《圣祖本纪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册,第253—257页。

④ 据笔者统计,康熙帝千余首诗中,多为五七言绝句或律诗,长律、古体仅88首,似亦与其无暇在文辞方面费心有关。

⑤ 康熙帝诗词用典较少,辞藻亦不刻意研炼,自我评价谓“小诗自觉乏文丽”(《忆陕西二首》,作于康熙六十一年九月),颇近实际。《御制避暑山庄诗》(清康熙五十一年武英殿刻本)由揆叙等奉敕详注刻行,不过这些注中,绝大多数仍是注释语辞而非典故。

也,先看绿萼清标。(《风入松·腊日》)

这首词意旨明确,且与康熙帝的很多诗词作品一样,皆存在词意复查之弊,如“待腊”“嘉平”“岁暮”“隆冬”等词意复,“雪花”“琼瑶”二词意复。不过,词中仍可见隆冬待春的富贵景象以及身处其中而不忘民生的帝王情怀,其内容已是康熙帝词中最丰富者。

再次,就其功用而言,词同样也是康熙帝鼓吹“文治”、君臣赓和、塑造“太平致治”景象的工具。四十四年(1705)第五次南巡时,康熙帝御制《柳梢青》词:

大块光风。春畴一望,满目从容。桂棹初摇,牙樯始立,淑色烟笼。堤边对对宾鸿。村庄里、安平气融。乐志情深,读书意远,与古和同。

这首词颇能反映康熙帝心境旨趣,因此他不止一次颁示给臣工。初作完时,即以之“示直隶巡抚李光地等。李光地奏曰:‘臣等仰瞻圣制,不独辞韵精妙,而治天下之大道寓焉。岂惟近今罕觐,即从古亦无此佳什。允堪昭垂万世,传之无极。’”^①三月十八日康熙帝生日,江苏巡抚宋荦请安时,康熙帝又命侍卫“捧出御笔书扇二柄:一墨书金扇,一金书石青扇,俱御制《柳梢青》词。云:‘可与宋巡抚看。’”^②而当时扈从群臣亦或有和词,如康熙丙辰科榜眼胡会恩即有和词《柳梢青·恭和圣制田家春日韵》^③。这样君臣赓和的例子还有尤侗之子尤珍的《柳梢青·恭和御制金莲花词》^④。而《太平时·立春》一首,更为查慎行、陈璋、汪灏、吴陈琰等更番迭和,允为盛事^⑤。康熙君臣的这些作品虽难臻上乘,却很能反映太平盛世偃武修文之象,并客观推动上层社会文人群体中的词创作实践。

最后,康熙帝创作词时,还曾有意创作诗,虽有体裁的不同,二者内容和旨趣却相当接近。例如:《点绛唇·橈灯》之前尚有七律《橈灯》一首(《康熙诗词集注》,第601页):

泊舟浅水意如何,为惜春光怡兴多。倚槛晚晴吟皓月,推窗夜静悦清波。冰消浪洁鱼吹沫,风转云开雁踏莎。更有橈灯分掩映,辉煌岂亚扣船歌。(《橈灯》)

夜静更深,船窗临淀见波影。出看何景。反照连橈灯。自笑不文,难得佳词整。嘱毛颖。水平天永。淡露春风冷。(《点绛唇·橈灯》)

一诗一词,虽体格有异,内容却大致相同:皆紧扣题意,开首起兴,随后切题直接描写橈灯,末尾写创作意图或背景。与此相似的诗词“同题共作”还有一例:《鹧鸪天·擎盖荷珠》和七绝《雨后戏题回文诗》(《康熙诗词集注》,第661页)。而《热河三十六景诗》中,词虽有三首,其意旨、辞藻等却均与同卷中的诗相仿佛,甚至就可以看成是“句读不葺之诗”(《康熙诗词集注》,第561—594页)。可以说,这种“同题共作”消弭了诗词的界限,也使得其诗集中“聊备一体”的词相当程度地接近于诗。

二

其实在康熙帝的心目中,诗余(词)与诗并没有完全的畛域之辨。在其为《御选历代诗余》、《钦定词谱》钦定的序中,也贯彻着同样的观点:

诗余之作,盖自昔乐府之遗音,而后人之审声选调所由以缘起也。而要皆昉于诗,则其本末

①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册,第211页。

② 宋荦《迎銮日记》卷三,《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册,第677页。

③ 张宏生等《全清词·顺康卷补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册,第1433页。

④ 程千帆等《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册,第8515页。

⑤ 此次唱和详情参见沈玉亮、吴陈琰编《凤池集·诗余》,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第3a—4b页。《全清词·顺康卷》载录查慎行(第16册,第9124页)、陈璋(第18册,第10298页)、汪灏(第14册,第8423页)词,然缺载陈璋词第二阙并吴陈琰和词。

源流之故有可言者。古帝舜之命夔典乐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可见唐虞时即有诗，而诗必谐于声，是近代倚声之词，其理固已寓焉。降而殷周，孔子删为三百五篇，乐正而后雅颂得所。考其时郊庙明堂升歌宴飨，以及乡饮报赛，莫不有诗，以叶于笙箫琴瑟之间。自诗变为骚，骚衍为赋，虽旨兼出乎六义，而声弗拘于八音。至汉，而郊祀、房中、饶歌、鼓吹、琴曲、杂诗，皆领于乐官，于是始有乐府名。迄于六代，操觚之家，按调属题，征辞赴节，日趋婉丽，以导宫商。唐兴，古诗而外，创为近体，而五七言绝句或传于伶人，顾他诗不尽协于乐部。其间如李白之《清平调》《忆秦娥》《菩萨蛮》，刘禹锡之《浪淘沙》《竹枝词》，泊温庭筠、韦庄之徒，相继而作，而新声迭出，时皆被诸管弦。是诗之流而为词，已权舆于唐矣。宋初，其风渐广。至周邦彦领大晟乐府，比切声调，篇目颇繁，柳永复增置之，词遂有专家。一时绮制，可谓极盛。虽体殊乐府，而句栉字比，廉肉节奏，不爽寸黍，其于古者依永和声之道，洵有合也，然则词亦何可废欤？（《御选历代诗余序》）^①

词之有图谱，犹诗之有体格也。诗本于古歌谣，词本于周诗三百篇，皆可歌。凡散见于《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者，班班可考也。汉初乐府亦期协律，魏晋讫唐，诸体杂出，而比于律者盖寡。唐之中叶，始为填词，制调倚声，历五代、北宋而极盛。崇宁间大晟乐府所集，有十二律六十家八十四调，后遂增至二百余，换羽移商，品目详具。逮南渡后，宫调失传，而词学亦渐紊矣。（《钦定词谱序》）^②

《御选历代诗余序》作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七月十二日，《钦定词谱序》作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七月十六日。从具体时间上看，这两篇序应不是康熙帝亲自撰写，而是由文臣撰写并得康熙帝首肯的。但两者前后相承，观点一致，虽非康熙亲笔，却是文臣承旨而撰，其所反映的，仍应是康熙帝所代表的具有浓重官方色彩的词学观念^③。从《御选历代诗余序》中也可看出，康熙帝及其文臣对词史并不特别熟悉，甚至于将周邦彦、柳永二人先后倒置，其后才在《钦定词谱序》里不动声色地修订。不过，这一种小错误并未影响他们的大判断——词“盖自昔乐府之遗音”，“皆昉于诗”，“本于周诗三百篇”。可以说，词是诗之余、乐府之余是他一以贯之的看法，而“诗余”“词”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称呼。在其心目中，词史实际上就是诗歌递嬗史。

但若细细分析，仍可以看出这些词论中错综杂糅的一面。历史上，自词这一文学体裁兴起以来，关于其起源的追问便层出不穷，虽然“词乃小道”“艳科”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为词尊体、将词升格并配享于其他文体却同样也是词论者们一直孜孜不倦努力的目标。北宋人开始有意识地将词上配于诗，苏轼在《祭张子野文》中提出词“盖诗之裔”^④，其词又被时人认为是“以诗入词”（陈师道《后山诗话》）、“句读不葺之诗”（李清照《词论》）；而南宋王灼开始明确认同词、乐府与诗同源^⑤，张侃则认

① 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 王奕清等《钦定词谱》卷首，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1册，第1—5页。

③ 康熙四十六年（1707）七月十二日，帝在巡幸塞外途中，“驻蹕喀喇和屯”（《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册，第302页）；康熙五十四年（1715）七月十六日，帝在西征策妄阿拉布坦军营，“驻蹕行宫，是日赐左都御史掇叙御书匾额，赐大臣、侍卫、护军参领、护军校、护军执事人员、七省官兵西瓜香瓜”（《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9册，第14525—14526页）。如二序为康熙帝御笔亲撰，则《清实录》《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皆当记载，实则二书皆未录此事，而戎马倥偬中，康熙帝亦不可能亲自撰序，故可判定二序应当是文臣撰写，后得康熙帝首肯。此外，《全唐诗》《佩文斋咏物诗选》《全唐诗》《历代题画诗类》等书，其序的撰定情况，皆与此类似。

④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册，第1943页。

⑤ 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73页。

为“乐府之坏，始于玉台杂体。而《后庭花》等曲流入淫侈，极而变为倚声”^①，明代俞彦、杨慎等人继之，也认为词与乐府系出同源^②。无论是诗之苗裔，还是乐府之遗，这两种词源说在历史上都有着极广泛的影响，同受康熙帝荣宠的两位词人宋荦、尤侗即分持这两种观点^③。而康熙帝及其文臣正是将这两种词源说混同糅合，形成了官方词论观念，并使得当时人心目中有关文体递嬗问题的相关认识变成了为词寻根究源、托体推尊的历史依据。既然词和乐府、诗同源，“班班可考”，那么，“词亦何可废欤”？康熙帝及其文臣正是通过这样的逻辑完成了其对词的实际功用的论证。

于是，康熙帝推尊词体的目的便渐趋明朗：他并不只是为了陈述词史上简单的事实，而是为了借此确定其选词的标准。康熙帝云：

词者继响夫诗者也，朕万几清暇，博综典籍，于经史诸书有关政教而裨益身心者，良已纂辑无遗。……乃命词臣，辑其风华典丽悉归于正者为若干卷，而朕亲裁定焉。（《御选历代诗余序》，《御选历代诗余》，第2页）

是选录其风华典丽而不失于正者为准式，其沉郁排宕、寄托深远、不涉绮靡、卓然名家者，尤多收录。（《御选历代诗余·钦定凡例》，《御选历代诗余》，第3页）

值得注意的是，“风华典丽悉归于正”的前提正是“有关政教而裨益身心”。康熙帝既然将词上配诗及乐府，那么其选词的标准自然与选诗的标准相同，简言之，即遵从所谓的“诗教”。对此，康熙帝还有一段评论：

夫诗之扬厉功德、铺陈政事，固无论矣，至于《桑中》《蔓草》诸什，而孔子以一言蔽之曰“思无邪”，盖蕙苴可以比贤者，嚶鸣可以喻友生。苟读其词，而引伸之、触类之、范其轶志、砥厥贞心，则是编之含英咀华、敲金戛玉者，何在不可以“思无邪”之一言该之也？若夫一唱三叹，谱入丝竹，清浊高下，无相夺伦，殆宇宙之元音具是。推此而沿流讨源，由词以溯之诗，由诗以溯之乐，即箫韶九成，其亦不外于本人心以求自然之声也夫！（《御选历代诗余序》，《御选历代诗余》，第2页）

强调“思无邪”，强调寄托，类似的语言，也可以在康熙帝其他文章中读到：“在昔诗教之兴，本性情之微，导中和之旨，所以感人心而美谣俗，被金石而格神祇。……乃取兹集，亲为鉴定，赐以帑金，即命校刊。俾诵习者由全唐之诗沿波讨澜，以上溯夫汾泗之传，而游泳乎唐虞‘载赓’之盛，其于化理人心将大有裨益也矣。”^④“《诗大序》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其阐明虞廷言志之意，而归本于心者，其意深矣。盖时运推移，质文屡变，其言之所发虽殊，而心之所存无异。……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之言，诗法也，即心法也。”^⑤其说法或稍有异，主旨却都是为了弘扬诗教。

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康熙帝组织人力，大规模地编纂历代文化典籍，其中包括多部诗文总集：从《全唐诗》到《宋金元明四朝诗选》，从诗总集到分体诗选（《咏物诗选》《历代题画诗》），再

① 张侃《拙轩词话》，《词话丛编》，第1册，第189页。

② 俞彦《爱园词话》“词得与诗并存之故”条，《词话丛编》，第1册，第399页；《词品》卷一“梁武帝《江南弄》”条，《词话丛编》，第1册，第421页。

③ 宋荦《瑶华集序》：“填词之名，肇于唐李供奉《忆秦娥》《菩萨蛮》二阙，而其实自《雅》《颂》《繁》《遏》《渠》等篇，已具错综抗坠之法，早为温韦诸君子滥觞已。”（蒋景祁《瑶华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页）尤侗《延露词序》：“‘小楼昨夜’，《哀江头》之余也；‘水殿风来’，《清平调》之余也；‘红藕香残’，《古离别》之余也；‘将军白头’，《从军行》之余也；‘今宵酒醒’，《子夜》《懊侬》之余也；‘大江东去’，鼓角、横吹之余也。”（彭孙通《延露词》卷首，清康熙间留松阁刻本，第1a页）

④ 《清圣祖御制诗文》卷二〇《全唐诗录序》，第5册，第159—160页。

⑤ 《清圣祖御制诗文》卷二一《四朝诗选序》，第5册，第169—171页。

到编纂历代词总集。这些典籍，或由康熙钦命纂集，或由臣工自行编纂，完成后再呈进御览，但都由康熙帝钦定序言。这些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和康熙十八年（1679）开设博学鸿词科一样，同属康熙帝“文治”大业的两项重要举措，不过二者又略有不同。博学鸿词科“网罗知名士；不足则更征山林隐逸，以礼相招；不足则复大开明史馆，使夫怀故国之思者或将集焉。上下四方，皆入其网”^①。其措施在于因势利导，疏导鼎革之际遗民文士的才思情绪，并借以扭转清初的学术走向。而其后的纂集历代典籍，并钦撰序言，则已变成创策垂法，即康熙帝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主动诏告并推阐诗教之旨。而将词上配于诗，并在其中贯彻诗教，正是康熙帝在诗文领域中时代由远及近、文体由本及末地推阐诗教的又一次努力。有意思的是，其所使用的方法和达到的效果，与清初词学的尊体运动，都颇有相似之处。

清初词坛上，鄙薄明词、重振词学已成为共同的呼声。不过，如何振兴词学，各家各派却有不尽相同的看法。究其根本，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他们对词体式认识的差异。云间词派从词自身体性出发，发展了自宋以来的本色当行论；广陵词人群基本沿袭云间派的看法，但加入了明人婉约、豪放的正变之分；阳羨词派尊体主张最为彻底，陈维崧直接将词与经史并列，提出在词中存经存史的概念^②；而浙西词派巨子朱彝尊的词论则颇为复杂，从最初的赞同词“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陈纬云红盐词序》），到稍后认为“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词综发凡》），再到认为“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紫云词序》）^③。词由反映乱世风云过渡到润色太平，其中转变，深刻地反映了时势的变化。

从时间上看，康熙帝及其文臣的词论较上述诸派要迟，其观点也带着参酌诸家、官方论定的色彩。他一方面认同词上配诗、乐府，强调其中寄托之意，另一方面又以“风华典丽悉归于正”为选词标准，反映其“文治”深化后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指向并不完全一致，其对词坛的影响也必将是多层面的。

三

如前文所述，康熙帝一系列词学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阐诗教，其词论与其诗教观一脉相承，虽有杂糅之嫌，却也确立了其词学标准。需要追问的是，该如何贯彻这一标准呢？根据历史经验，最好是通过选本将选词的目的和意图体现出来。而且，面对着清初词选大量出现的客观形势，也确实需要一种大型的定本来表达官方的声音。康熙帝于此有很清楚的认识，在其词创作“试水”的同时，即已有意识地为《御选历代诗余》及稍后的《钦定词谱》挑选合适的编纂人员。这两项文化工程的实际操作人员——《御选历代诗余》的“编录人员”和《钦定词谱》的“分纂人员”，正是在这一时期，被康熙帝有意识地拔擢起用。而且，在编纂力量的配置上，康熙帝的选择也颇为微妙。

首先，康熙帝并没有选用词坛耆宿来为这两项词籍编纂负总责。《御选历代诗余》的“总纂官”沈辰垣、王奕清、阎锡爵、余正健四人俱属高官“坐纛”，他们于词学一道，并无专门涉及，亦未见有词创作，其中三人（除沈辰垣外）后来还转任《钦定词谱》的“纂修官”；与前书相比，《钦定词谱》编纂人员更有加强，在“纂修官”之上，还设置了“南书房总阅官”（陈廷敬）和“南书房校对官”（蒋廷锡、励廷仪、张廷玉、陈邦彦、赵熊诏、王图炳）（《钦定词谱》卷首，第1册，第1页），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② 参见陈水云《康熙年间词学的辨体与尊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③ 参见朱彝尊《曝书亭全集·曝书亭集》卷四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3—454页；朱彝尊《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发凡》第14页。

显示了康熙帝对两书的重视程度在操作中实际有所递增。不过,无论“总阅官”还是“校对官”,除陈廷敬外,其余人等并未在词的创作上留下更多印记^①。当时其身边还有查慎行等词学名臣,康熙帝为何选择并不善于词学的臣工负总责?其根本原因,可能还是为了毫无障碍地推行其独特的词学观,保证“政治正确”,选择对词学并无专长的臣工坐镇,更能切实执行其意旨,也更能反映康熙帝对词学的特别重视。

其次,选择负责具体工作的臣工时,康熙帝则在据才擢士的同时,特别注意起用学有专长的人员。康熙四十四年(1705)南巡时召试江南生员,其目的最初是为了选拔迎銮献册的有才学者及“愿在内廷书写者”,最终“取中考试人员汪泰来等五十人,同前考郭元釭等十人”^②。这次录取的名单,保存在《江南通志》中,检索可知,《御选历代诗余》的十八位“编录人员”、《钦定词谱》十三位“分纂人员”中的十二位,都在这次召试时高中。除此之外,该名单还包括此后参与修纂《宋金元明四朝诗选》《佩文韵府》《御选唐诗》的部分人员^③。关于这次召试的具体内容,《清实录》谓系“考试苏州等府举贡生监诗字”,可知因为内廷书写的需要,书法也是一项重要的考试内容,吴学礼、吴襄、邬维新、杨潜等即是因书法而高中^④,不过,特殊情况下,康熙帝也会量才录用,杜诏(号云川)即是明显的例子:

乙酉,圣祖南巡,先生赋《迎銮词》十二章以献,深荷嘉奖。驻蹕苏州,召试行在。同时被试者二百人,钦取五十人,先生名与焉。回銮日,复进《梁溪望幸词》八章,召见御舟,奏对称旨,亲洒宸翰以赐。奉命入都,兼给帑金治行。泽州相国陈文贞公荐先生词学第一,遂充诗余馆纂修。丁亥,分纂《广西方輿路程》。己丑,又与修《词谱》,更历三馆。^⑤

杜诏应试之前,曾屡次献词,康熙帝对其才华已有所了解,因此在召试时,才会取中并不擅长书法的杜诏^⑥。可知杜诏召试中式,正是因为其卓异的词学才华。与杜诏命运相似且具代表性的,还有吴陈琰和楼俨。

吴陈琰是曹溶的学生,康熙二十一年(1682)时,即与唐梦赉唱和,结集成《辛酉同游倡和集》,词名震动江南,王士禛甚至曾折节订交;康熙四十四年(1705)应召中试后,吴与沈玉亮一起编纂《凤池集》,记录随驾唱酬盛况^⑦。楼俨是《钦定词谱》“分纂人员”中唯一一位未参加康熙四十四年南巡召试的成员,他与康熙帝的遇合在两年后。其时,楼俨已是著名的词人:“少颖异绩学,工填词。家贫,转徙云间。康熙四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南巡,献织具图诗词,特擢第一。四十八年,奉诏修《词谱》,以荐,与分纂之役。”^⑧楼俨后来回忆《钦定词谱》的编纂时说:

俨以孙学士松坪师荐,因与云川奉命同修词谱,领其事者,为泽州、京江两师相。时中允王

① 陈廷敬亦仅存词二首,参见《全清词·顺康卷》,第14册,第7966页。他为杜诏词集作序时亦自认:“余雅不好填词。”(杜诏《云川阁集·词》卷首,清雍正间刻本,第2b页)

② 《迎銮日记》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第680、683页。

③ 黄之隽等《〈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三六,《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3册,第587—588页。唯该书将此次召试系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误。

④ 李放《皇清书史》卷五、六、一四,周骏富编《清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83册,第171—172、202、450页。

⑤ 杨绳武《杜诏墓志铭》,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二四,《清代传记丛刊》,第149册,第130—131页。

⑥ 陈廷敬《云川阁集词序》:“生不善书,而词甚工,复拔置第一。旋命纂修《历代诗余》。”(《云川阁集·词》卷首,第2b页)

⑦ 鲁竹《浙西词人吴陈琰考议》,《台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⑧ 《清史列传》卷七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册,第5826页。

公奕清、庶子阎公锡爵、司成余公正健为总裁。同馆则今吴学士襄、储编修在文、王编修时鸿、杨检讨潜、杨编修祖楫、吴怀柔景果暨云川与俨，共八人。诸君子皆高才宿学，而云川尤于词研精深造，有独得焉者。始开局于莲花湾，继同寓枣香书屋。相与寻官数调，靡间朝夕。^①

选用这一批卓有盛名的词家参与《御选历代诗余》和《钦定词谱》的编纂，既为江南地区功名落拓的文士提供上进之路，也为这两部书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那么，臣工们有没有将康熙帝的意旨忠实地贯彻到《御选历代诗余》的选政和《钦定词谱》的编纂中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明了两书的特点：“《钦定词谱》大致保留了《历代诗余》的编纂队伍，因此两部书在词学观念上有连续性，对格律谱制作的看法也保持了一致。……而从编纂内容角度来看，《历代诗余》实际上为《词谱》之编纂做好了基础性的文献工作。”^②《钦定词谱》主要是一本词学工具书，《御选历代诗余》则更适合承载编纂者的词学观念，最适合体现康熙帝的意旨，因此，此处着重分析《御选历代诗余》。

《御选历代诗余》是词史上规模最大的通代词选本，凡一百卷，收词共九千余阙，后附词人姓氏、词话凡二十卷。该选选域宽弘，上起唐初沈佺期、李景伯等，下迄明末陈子龙、夏复（完淳），近一千年间的词作，大略该备。由于该选内容极复杂，目前学界尚未对其进行整体研究，但已有学者通过对个别词人在该选中的入选词作比例（按即入选词与其时存世词之比），发现黄庭坚词入选比例较低，从而认为是因黄词在词史上向受疵议，“笔墨海淫”，该选选录较少，正能反映康熙帝“风华典丽不失于正”的选词主张^③。如此处理，不失为探析该选的一个角度。可惜的是，由于分析词家较少，尚不足以揭示该选的真实意旨。我们知道，《御选历代诗余》的选录重心在两宋，该选中对两宋词人的选阵最能反映选家的意旨。因此，有必要对两宋重要作家在该选中的入选比进行细致的分析，参见〔表1〕：

词人	《御选历代诗余》 入选量	《宋六十名家词》 收词数	入选比	词人	《御选历代诗余》 入选量	《宋六十名家词》 收词数	入选比
晏殊	100	131	76.3%	刘过	30	51	58.8%
柳永	147	194	75.8%	张元幹	62	185	33.5%
欧阳修	132	170	77.6%	张孝祥	64	180	35.6%
苏轼	197	329	59.9%	姜夔	35	34	102.9%
晏几道	182	254	71.7%	史达祖	101	112	90.2%
黄庭坚	85	178	47.8%	吴文英	229	274	83.6%
秦观	70	87	80.5%	高观国	79	107	73.8%
周邦彦	164	194	84.5%	刘克庄	47	123	38.2%
陆游	91	131	69.5%	卢祖皋	28	25	112%
辛弃疾	282	561	50.3%	蒋捷	75	93	80.6%

〔表1〕

本表中未列张炎、王沂孙，系因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未收录其词。张炎《山中白云词》全本八卷凡三百阙，于康熙十八年（1679）由朱彝尊等附刻于《浙西六家

① 楼俨《云川阁集序》，《云川阁集·词》卷首，清雍正间刻本，第4a—4b页。

② 江合友《明清词谱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③ 《康熙与清初文坛》，第265—268页。

词》后,《御选历代诗余》选录 221 阙,入选比 73.7%;王沂孙词一直以钞本流传,乾隆中方由鲍廷博知不足斋刻行,收词 51 阙,另附自词选所辑 14 阙为补遗,考虑到《御选历代诗余》未及见此刻本,然选录王词 42 首,入选比例亦颇高^①。

由此表可以看出:第一,辛弃疾、刘过、张元幹、张孝祥、刘克庄等辛派词人的词作入选比明显偏低,表明了稼轩词风在清初盛行一时之后的回落;张元幹、张孝祥入选比较低,可能与其词反映抗金活动有关;辛派后劲刘克庄入选比亦极低,则反映了选者对叫嚣词风的扬弃,与康熙帝的标准相合。第二,姜夔一系的南宋词人(史达祖、吴文英、高观国、卢祖皋、张炎、王沂孙)词作入选比较高,这主要反映了选家对朱彝尊词学观念的接受,朱彝尊论词崇尚姜夔、张炎,认为“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②。前节已述,朱彝尊亦主张以“雅”衡词,因此,对姜夔一系词人词作的推崇也与康熙帝的尚“雅”主张相符,尽管朱彝尊的理念和康熙帝还存在一定差距。第三,北宋词人的入选较南宋姜夔一系的词人要低,反映了选者在“南北宋之争”议题上的倾向,亦与朱彝尊词学观念有关,然而此处不能看出选者对康熙帝词论的回应。第四,柳永词作入选比例远高于黄庭坚,黄庭坚入选比例低反映了选者“雅”之准绳,“骀散从俗”(陈师道《后山诗话》)、“词语尘下”(李清照《词论》)、“浅近卑俗”(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的柳永高比例入选却与此扞格,为何出现此种现象?据笔者查考,这与《御选历代诗余》兼具存调类词选特征有关。《宋六十名家词》载柳永词 194 阙,填词调 146 个,部分词调尚有异体,甚至有很多是柳永所创填,《御选历代诗余》可能正基于存调目的,才大量选入柳词。

可以看出,《御选历代诗余》的选者一方面秉命于康熙帝,在该选中执行其论词尚雅的主张,另一方面又能够切实反映出词坛风尚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达成了官方理念和民间词论的兼容。其价值,确实能“兼括洪纤”,“可云集大成矣”^③。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极具官方色彩的《御选历代诗余》,康熙帝还另有一种颇具特色的词选传世,这就是《御选唐宋词》。

《御选唐宋词》文本极为独特,该书附载于《御选唐宋元明诗》(《故宫珍本丛刊》,第 633 册)后,选唐诗 35 阙,以作家时代先后列序,就中以温庭筠、和凝词选录最多(各 4 阙);选宋词凡 57 家 110 阙(北宋 79 阙,南宋 31 阙),以小令(62 阙)、中调(23 阙)、长调(25 阙)为序排列,入选数前五位词人是苏轼(10 阙)、秦观(10 阙)、周邦彦(8 阙)、张先(4 阙)、欧阳修(4 阙)。其余词人选 1—3 阙不等,未选辛弃疾词。《御选唐宋词》重视唐五代、北宋词,轻视南宋词;多选小令,少选长调;多选苏轼、秦观等北宋名家,南宋名家如姜夔、张炎、王沂孙、吴文英以至辛弃疾、刘过、刘克庄等人皆未入选。论其旨趣,可知《御选唐宋词》的实际编选人员,应该对云间词派的理论较为服膺,与后起的阳羨词派、浙西词派则有着较大程度的疏离。

《御选唐宋元明诗》以写本形式深藏宫中,向为学界罕见,其书据时代分卷,每卷中分体选诗。值得注意的是,唐诗卷后尚有《对类》一卷,是类似于《笠翁对韵》的对联启蒙书。可以推测,《御选唐宋元明诗》并其所附的《御选唐宋词》应当也是启蒙类的图书。至于是康熙帝命令臣工编纂以自用,还是准备以之教育皇家子弟或颁行天下,由于资料缺载,现在已经不可详考。可以肯定的是,康熙帝并未赠予该书以赐序颁行的荣宠,表明他并不满意该书,而该书在词史上的影响也因而消歇。

不过,《御选唐宋词》的存在,仍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例证,使我们对康熙朝词学的演进变化,

① 张炎、王沂孙词集流传情况,参见蒋哲伦等《唐宋词书录》,岳麓书社 2007 年版,第 561—562、568—570 页。

② 《曝书亭全集·曝书亭集》卷四〇《黑蝶斋诗余序》,第 453 页。

③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2806 页。

特别是各词学流派争夺话语权的竞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直观地看,云间词派、阳羨词派、浙西词派在词坛的升沉异势正可体现在《御选历代诗余》和《御选唐宋词》的显隐异势上。康熙帝对二书的不同处理,反映了他的词学选择。这一选择,也正是词坛风尚转变的潜在而实际的原因。

四

康熙帝的词作,在当时即为群臣赓和;乾隆时,部分作品又被乾隆帝追和^①。他的词创作在词坛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其对于词学的热忱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雍乾词坛满蒙贵胄词人群体的壮大。这些包括皇族词人在内的满蒙词人^②不废吟咏,风格雍容华贵,内容相似度高,与康熙帝词风接近,能够构成贵族文坛上独特的词学风景。

康熙帝选命臣工编纂词籍,也标示着词学正式得到官方的承认和支持,并促进了有清一代词学和词籍编纂的兴盛。他的作为此后成了词家反驳词学小道淫艳说的最有力的论据。例如,乾隆中蒋重光编《昭代词选》,即曾理直气壮地声称:“我圣祖有《钦定词谱》《御选历代诗余》二书垂世,亦以淫艳教也?不亦谬哉。”^③

以上两点,前贤已有涉及,前文亦曾补述,此处不再详论。至于康熙帝词论对词坛的影响,严迪昌先生认为:

对于“盛世”雄主说来,“钦定”《词谱》和《历代诗余》未尝不是文治大业的一桩。但在“官调失传”已数百年,重开已无官调可弦的新的“大晟乐府”,津津导引词人们去寻觅“古昔乐章之遗响”,这对脱离音乐而成独立抒情文体的词来说,不管是釜底抽薪的一次整肃。……所以,说《钦定词谱》等颁行,清词“中兴”气象开始蜕化,高峰趋于退潮,活跃期转入沉闷,并非是随意性的揣度。……以上事实证明,玄烨君臣的编纂《词谱》和《历代诗余》并不纯是风雅之举。他们对清初以来词坛是熟悉的,因而是意识性极强的以图有所“匡正”词风的行动。^④

严先生这段话主要论《钦定词谱》,但其批评却涉及《御选历代诗余》在内的康熙帝词论意旨。严先生的论述虽有其立论背景,但却值得商榷。

首先,康熙君臣间关于词学的理解并不完全契合。《御选历代诗余》的选者固然在选本中贯注了康熙的词论,但在具体的操作中仍受其自身词学观影响。通过其选阵可以看出,该选其实是透出浙西词派意味的选本,虽与《词综》有形式的不同,观念却非常相近。

其次,探究声律是词学尊体和辨体的途径之一。明清之际词谱编纂的兴盛,不仅是词学研究深入进展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愈趋精确地为词学创作揭示了必要的轨范,使得其辨体日精,有益于摆脱明词类曲那样的习气^⑤。康熙帝“钦定”《词谱》在这方面做了鼓励、示范和总结,其对于词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是很大的。

再次,康熙帝于词学并未学有专门,他对词史的认识甚至有舛误,他的词学观也是附属于诗教观的。他一方面以“雅”为标的,另一方面,又强调词中须有“寄托”。有意思的是,虽然“雅”和“寄托”都是词学方面的一般概念,但在特定条件下却并不兼容。以朱彝尊为例,康熙十八年

① 参见《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卷下,清乾隆六年(1741)内府重刻本。

② 如弘晓、永恩、永忠、永正等人皆有词作,参见张宏生编《全清词·雍乾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9、15册,第4179、4451、5127、8645页。阿克敦、纳兰常安、福增格、恒仁、于宗瑛、全德等,都是乾隆时著名的满蒙词人。

③ 蒋重光《昭代词选序》,《昭代词选》卷首,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经锄堂刻本,第1b页。

④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338页。

⑤ 参见张宏生《明清之际的词谱反思与词风演进》,《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1679), 朱氏进京, 倡“后乐府补题”唱和, 正是抽去了《乐府补题》中的寄托——故国之思, 而强化了词作形式上的“雅”, 显示了词坛为适应新朝而作出的一种调整。康熙帝的作为, 却正好和朱彝尊异趣: 他对“雅”的强调和浙西词派风尚相符, 对“寄托”的推崇则在无意中给陷于日织日密的文网中的后世词家们以方便法门。

浙西词派发展到乾隆中期, 其创作为形式单一、内容贫乏的瓶颈所限, 浙派词家王昶适时重提被朱彝尊弃去的“寄托”说, 正是受到了康熙帝词论的鼓励。王昶云:

昔圣祖皇帝表章六艺, 兼综百家。合《全唐诗》而编辑之, 益之以词。又取唐宋元明之词, 汇为一百二十卷。又定《词谱》四十卷, 而后词学始全, 用以示海宇而光艺苑。其汲汲于此, 盖以词者乐府之条理, 诗之苗裔, 举一端而六艺居其二焉, 故论次之不遗余力也。浅夫俗士, 辄以小道薄技目之, 何足以仰窥圣言之大哉?^①

因此, 他也尝试将词学上附诗教: “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 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 所以为高。”^② “北风雨雪”意象出自《诗经·邶风·北风》, “黍离麦秀”意象则出自《诗经·王风·黍离》与《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所咏佚诗, 这两种意象寄托着羁旅行役、感时忧国等复杂的情感, 王昶正是通过词中寄托来判断词的高下。这一方法后来被常州词派借鉴, 对清代后期词学启发最大。究其根源, 仍在于康熙帝的“天语纶音”。

康熙四十三年(1704), 词坛耆宿顾贞观致信陈聂恒, 面对其时词学不振的窘境而回忆起与纳兰容若唱酬的盛况, 他说: “假令今日更得一有大力者, 起而倡之, 众人幡然从而和之, 安知衰者之不复盛耶?”^③ 康熙帝应当就是这样一位应运而起的“有大力者”, 关注词学也是他“文治”的一项内容。他一方面通过创作影响词坛, 另一方面通过编纂词籍来承认词学的地位。他的词学活动标志着词正式被纳入正统的主流文学范围中, 虽然其词论尚有杂糅浅显处, 其创作亦未臻上乘, 但他的鼓吹仍然是难能可贵的。而且, 其词论虽然给词创作订立了一些规矩, 作出了一些限制, 但其观点的疏漏正可使后人“遵旨”阐发, 为词学的再度发展提供门径。总之, 作为崇尚“文治”的一代帝王, 康熙帝对词坛的影响无疑是多元而深远的。

[作者简介] 陈昌强, 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南北宋之争与清代浙西词派的发展演进》等。

(责任编辑 马 昕)

① 王昶《春融堂集》卷四一《吴竹桥小湖田乐府序》, 清嘉庆十二年(1807)塾南书社刻本, 第6a页。

② 许宗彦《莲子居词话序》引王昶语, 《词话丛编》, 第3册, 第2388页。

③ 顾贞观《顾梁汾先生书》, 陈聂恒《桐园词弃稿》卷首, 清康熙间且朴斋刻本, 第3b页。